

## 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及原因分析

马 伟

(青海民族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 本文根据在撒拉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对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及濒危原因作了分析,以期能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保护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撒拉语;濒危状况;原因

中图分类号:H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9)01-0039-12

## The Situation and the Cause of the Endangerment of Salar Language

MA W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work in the Salar area,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the cause of the endangerment of Salar language, hoping to give some help to the language protections for the China's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

**Key words:** Salar; endangerment; cause

语言的濒危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作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语言,作为在世界上地理位置离突厥语中心区最远的语言之一,撒拉语的濒危状况目前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本文将根据撒拉语目前的使用情况,来分析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并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以期能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保护工作有一定裨益。

### 一、撒拉语是濒危语言吗?

#### (一) 濒危语言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濒危语言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2000年10月16日,由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北京共同举办“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会上,学者们对什么是濒危语言也给予了认真的讨论。黄行说:“所谓的濒危语言通常可以理解为使用人口比较少、社会使用功能逐渐萎缩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许多民族语言因没有自己的文字和书面语,规范程度低,所以一般都处于某种濒危的状态,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曹志耘提出“濒危”就是“接近”危险的境

地,对语言而言就意味着濒临消亡。陈其光说:

我个人认为关于濒危语言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弱势语言,另一类是濒危语言。其中所谓的濒危语言是快要死亡的语言。我认为濒危语言有3个特点:(1)大多数人已经转用了另外一种语言,只有少数人还讲自己的民族语言;(2)保存的民族语成了次要的交际工具,第二语言反而成了主要交际工具;(3)老一辈的人对本民族语的价值是肯定的、积极的,而年轻一代对本民族语的价值观念变了,对本民族语持否定的、消极的态度。语言价值观一变,语言保存很难。

照那斯图认为,濒危语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一是从使用方面看:濒危语言主要是个别人、个别情况下使用的语言,对整个民族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是这个民族的主要交际工具;二是从人们的语言态度来看:使用该语言的人们不再看重他们的语言,认为他们语言的消亡是自然消亡的结果,而不是同化的结果。此外,在这次会议上,张公瑾等学者们还将人口少也作为语言濒危的重要特征。孙宏开教授还建议把那些处在马上消亡,或者将那些在几年或十几年内就会消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濒危语言——撒拉语研究》之部分成果,批准号:04BYY037。

收稿日期:2008-11-03

作者简介:马伟(1970-),男,撒拉族,青海循化人,青海民族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语言文化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语言看作是濒危语言。<sup>[1]</sup>在关注濒危语言更早的国外学术界,对什么是濒危语言也有不同的解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提出,“当一种语言处于濒临消亡之路时,它就是濒危语言”。<sup>[2]</sup>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也指出:当父母不再给孩子们教他们的语言时,当他们在日常事务中不再积极地使用他们的语言时,他们的语言就被视作濒危语言。<sup>[3]</sup>

以上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濒危语言的使用功能一般都处在萎缩之中,也就是说,母语使用者由于使用一种更具优势的强势语言,使得自己的母语使用功能越来越弱,母语有濒临消亡的迹象。

## (二) 撒拉语是濒危语言吗?

那么,撒拉语是否属于濒危语言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1. 撒拉族文字的失传是撒拉语使用功能减弱的极强信号 撒拉族在历史上曾使用过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但目前已基本失传,读写该种文字的人已凤毛麟角。根据韩建业先生的描述,<sup>[4]</sup>笔者近十年在撒拉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以及马成俊教授近期在循化发现的清代期间用撒拉语撰写的有关水利文书,我们认为撒拉族文字在19世纪左右在撒拉族群众中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后来,由于撒拉族对汉文化的接纳,使得汉文逐渐地取代了撒拉族传统文字。虽然,在撒拉族聚居的地区,撒拉语仍然是族内主要口头交际工具,但书面交际工具已完全让位于汉文了。这种口语和书面文的脱节极大地限制了撒拉语的发展,使得撒拉语的保存形式仅仅存在于口头上,削弱了撒拉语的基础。这种文字转换发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那就是撒拉语的使用功能减弱了。这对撒拉语的发展或者存在都将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2. 汉语对撒拉语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强也是撒拉语功能衰退的表现 一般而言,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是正常的。但撒拉语和汉语之间的影响是不正常的,几乎是汉语对撒拉语一方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撒拉语大量使用汉语词汇上,而且表现在汉语对撒拉语在语音、语法方面的较大影响。由于汉语对撒拉语持续而长久的强烈影响,撒拉语的突厥语粘着语特征正在减少,而来自汉语的分析型特征却在增多。这也是撒拉语本身功能衰退的重要表现。

3. 母语使用者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也是语言

濒危的一个危险信号 最近几十年来,撒拉族人口增长较快,尤其是从1964~1982年间,全国撒拉族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5.51%。这种快速增长使得撒拉族从1953年的3.06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0.45万人,增加了两倍多。<sup>[5]</sup>人口的增加,使得撒拉族当中母语使用人数也相应地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放弃母语的撒拉族人数也在增加。据笔者调查,居住在城市的撒拉族在第二代时撒拉语已严重退化,相当一部分撒拉族孩子的第一语言已经是汉语了。在甘肃的撒拉族农村地区,只有老人会说撒拉语。那些即使在五十岁左右的人都已失去了母语。在新疆的撒拉族地区,维吾尔语或汉语已经取代撒拉语成为主要的交际工具。在乌鲁木齐市,只有极个别的撒拉族老人还在说撒拉语,绝大部分撒拉族已失去了母语。这已经预示着,随着撒拉族聚居地与外界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会有更多的人会放弃自己的母语。

4. 在科技、政治、教育有时甚至在宗教等方面即使是在撒拉族内部的交流,以汉语词汇为主的撒拉语和汉语的混合语,或者汉语基本上是主要的交流媒介。到目前为止,在撒拉族地区还没有应对这一问题的任何措施。这说明,撒拉语的生命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由此可见,随着汉语等对撒拉语影响的增强,撒拉语表现出使用功能日益减退的趋势,而且正朝着向汉语靠近的趋势发展。据此,我们认为撒拉语已经是一种濒危语言。下面,我们进一步谈一谈撒拉语的濒危程度。

## 二、撒拉语的濒危程度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语言学家们设计了一些不同的评估语言濒危程度的指标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费什曼(Fishman)<sup>[6]</sup>、爱德华兹(Edwards)<sup>[7]</sup>、克劳斯(Krauss)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以下简称UNESCO)等提出的评估标准。其中前两者构建了详细的指标体系,但并非专门针对土著民族的语言。克劳斯于1996年将北美土著语言划分成四种类型:(A)还在传承给下一代的语言;(B)青年们还在使用的语言;(C)只有老人们使用的语言;(D)只有极少数人使用的语言。<sup>[8]</sup>克劳斯发现的重要性在于他首次将北美土著语言令人担忧的濒危程度非常清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那么,撒拉语处在什么

样的濒危境地呢？对于撒拉语，我们将使用 UNESCO 所设计的标准，因为这个评估标准是由国际学者们集体设计出来的，相对而言，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UNESCO 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评价语言濒危程度的九项指标，每项指标又包含六个级别。5 级意为安全，4 级意为不安全，3 级意为确实濒危，2 级意为严重濒危，1 级意为极度濒危，0 级意为消亡。下面我们将分别用这些指标评估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并确定其一个大概的级别。<sup>[9]</sup>

指标1：代际间的语言传承

在撒拉族最集中的循化县，对绝大部分撒拉族儿童来说，撒拉语在上小学之前是他们唯一的交流工具。撒拉语被广泛使用于他们生活的各领域。在进入学校后，汉语成为教学语言，撒拉族儿童开始正规地学习汉语了。除在学校外，绝大部分儿童还在其他领域都使用撒拉语。（个人田野调查，2006 年）根据这种状况，我们确定代际间的语言传承指标为 4 级。在 UNESCO 的评估指标（见下表）中，当部分儿童在所有领域都使用该语言，所有儿童仅在有限领域使用该语言时，这种语言被归于 4 级，意味着该语言不安全。

指标2：语言使用者总人数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加拿大拉

濒危程度	级 别	使用人数
安全	5	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使用该语言。
不安全	4	仅有部分儿童在所有领域都使用该语言；所有儿童在有限的领域都使用该语言。
确实濒危	3	该语言主要由父母辈及以上的人使用。
严重濒危	2	该语言主要由爷爷、奶奶辈及以上的人使用。
极度濒危	1	该语言主要由极个别曾祖辈一代的人使用。
消亡	0	没有讲该语言的人。

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1982 年大约 90.6% 的撒拉族在使用撒拉语<sup>[10]</sup>。根据这一比例，我们再根据我国 2000 年人口普查，大约有 95,000 人撒拉语使用者。UNESCO 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人口数字来确定多少人使用的语言是濒危语言，或者不是濒危语言。但一般而言，使用人口越少，该语言越不安全。考虑到撒拉族周围的汉族、藏族、回族等民族的较大人口数量，95,000 个撒拉语使用人口数还是相当低的。因而，和汉语、藏

语等相比，撒拉语的安全程度相对要低很多。

指标3：语言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既然大约 90% 的撒拉族仍在 使用他们的语言，我们确定撒拉语在指标 3 上的级别为 4，因为根据 UNESCO 的标准，级别 4 表示基本上所有的该族人使用他们的语言（见下表），这就是说撒拉语处在 不安全的境地中。

濒危程度	级 别	语言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安全	5	所有的人使用该语言。
不安全	4	基本上所有的人使用该语言。
确实濒危	3	大部分人使用该语言。
严重濒危	2	少部分人使用该语言。
极度濒危	1	极少的人使用该语言。
消亡	0	没有人使用该语言。

指标4：语言使用领域的转变

撒拉语在许多方面仍在被撒拉族群众所使用，但是撒拉语受汉语影响很大，即使是在使用领域比较稳固的撒拉族家庭当中也如此（详见后面的撒拉语的使用状况部分内容）。如果祖先的语言在家庭领域的许多方面被使用，但在家庭领域也 还是受强势语言的影响，那么这种语言被 UNESCO 划定为 3 级（见下表）。因此，在指标 4 上，我们确定撒拉语的级别为 3 级。

濒危程度	级 别	领域与功能
普遍使用	5	该语言被用于所有领域，功能全面。
多语共用	4	在绝大部分领域使用着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发挥着它们的功能。
范围缩小	3	该语言被用于家庭领域，功能较大，但强势语言也开始进入家庭领域。
有限领域	2	该语言被用于有限的社会领域，功能有限。
极限领域	1	该语言被用于极有限的社会领域，功能极为有限。
消亡	0	该语言在任何领域都不使用，没有任何功能。

指标5：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

随着撒拉族社会的发展，学校、报纸、电视、互联网等也逐渐进入撒拉族人民的生活当中，但撒拉语并未进入这些新领域当中。这些新领域往往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象征，与这些领域的脱节意味着撒拉语的前景将会非常暗淡。如果一种语言不



能在新的领域使用 ,对媒体没有任何反应 ,那么 , UNESCO对这种语言在指标5上的评估标准为0级别(见下表)。因此 ,根据这些情况 ,撒拉语在这个指标上只能被划归到0级当中。

濒危程度	级别	濒危语言接受的新领域和媒体
充满活力	5	该语言在所有新领域中都使用。
有活力 / 活跃	4	该语言在绝大部分新领域中都使用。
运用领域较广	3	该语言在许多新领域中都使用。
只能勉强应付	2	该语言在某些新领域中被使用。
应对极为有限	1	该语言只在极少新领域中被使用。
没有反应	0	该语言在任何新领域中都不使用。

指标6 教育和读写语言材料

目前 ,撒拉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在生活中使用 ,也没有任何用撒拉语书写的课本读物。根据这种情况和UNESCO的标准(见下表) ,我们在指标6上给撒拉语确定1的级别。

级别	书面材料的可用度
5	有创制的文字系统 ,合乎语法的读写习惯 ,词典 ,课本 ,文学作品 ,日常媒体。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使用书面语言。
4	有书面材料 ,在学校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 ;在管理方面不使用该书面语言。
3	有书面材料 ,在学校儿童可能接触到这些材料 ;没有出版物用来提高读写能力。
2	有书面材料 ,但只对族群的部分人有用 ,对其他人只有象征意义 ;使用该语言的读写教育没被列入学校课程。
1	有可用的拼写符号为族群成员所了解 ,一些材料在编写当中。
0	该族群中没有可用的拼写符号。

指标7 政府机构的语言态度与政策及语言的官方地位与使用

我国宪法总纲第四条规定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同时在总纲第一

百三十四条规定 ,在法律诉讼中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需要时也可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

这些规定从政策上保障了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性 ,但由于种种原因 ,包括撒拉族在内的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同时 ,目前在公共场合中汉语已成了主要的正式用语 ,在正式场合中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书面撒拉语使用。根据UNESCO的标准(见下表) ,我们认为撒拉语在指标7方面的级别为3.5级左右。

支持程度	级别	官方语言态度
平等支持	5	所有语言都得到保护。
区别支持	4	少数民族语言主要作为在私人场所使用的语言而得到保护 ,使用该语言就获得好的声望。
被动同化	3	没有明确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强势语言在各种公共场合占有主导地位。
积极同化	2	政府鼓励趋向强势语言的同化 ,不保护少数民族语言。
强迫同化	1	强势语言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少数民族语言既不被承认也得不到保护。
禁止使用	0	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

指标8 族群成员对自己语言的态度

族群成员对自己语言的态度 ,直接影响着该语言的未来发展问题。虽然 ,积极的语言态度并不一定能保持语言活力 ,但可以肯定的是 ,消极的语言态度会对其语言发展极为不利 ,甚至有可能使其语言走向消亡之路。根据笔者在2004年至2006年在撒拉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对上百人的问卷调查和采访 ,绝大部分撒拉族热爱自己的语言 ,支持继续保持撒拉语 (详见撒拉语濒危原因分析部分)。因此 ,在指标8方面(见下表) ,我们觉得撒拉

级别	族群成员对自己语言的态度
5	所有成员重视并希望继续发展其语言。
4	绝大部分成员支持保持其语言。
3	许多人支持保持其语言 ,但部分人对此漠不关心 ,甚至主张放弃。
2	部分人支持保持其语言 ,但部分人对此漠不关心 ,甚至主张放弃。
1	只有极个别人支持保持其语言 ,其他人对此漠不关心 ,甚至主张放弃。
0	没有人在乎其语言的存亡 ;所有人倾向于使用强势语言。

语的级别在4级左右。

指标9 文献的数量与质量

评估记录一种濒危语言的紧迫性之前，必须先要了解清楚该语言现有文献资料。这种资料主要指通过对自然语言的视听录制，然后进行书面转写、翻译和注释方面的内容。撒拉语有较为完整的语法、语音、词典和民间文学方面的书面文献资料，有部分质量不同的视听录制资料，但没有撒拉语媒体。根据UNESCO的标准(见下表)，撒拉语在指标9方面的级别在3级左右。

记录状况	级别	语言记录
极佳	5	有全面的语法、词典，大量的文本，不断更新的材料；有充足的、高质量的视听注释材料。
良好	4	有一部完整的语法著作，几部不错的语法书、词典、文本和文学作品，偶尔更新的日常媒体；有充足的、高质量的视听注释材料。
不错	3	也许有一部不错的语法著作，有许多语法描写，有词典和文本，但没有日常媒体；可能有不同质量的视听录制和注释资料。
残缺	2	有一些语法概要、词语列表，对部分语言研究有用的、但涉及面有限的文本；不同质量的视听录制资料可能存在，有的有注释，有的没有注释。
稀少	1	只有极少的语法描写、很短的词语列表和残缺的文本；视听录制资料不存在，即使有也是质量差无法利用或者根本没有注释。
没有	0	没有文献材料存在。

如果我们把以上几个指标都综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撒拉语的濒危程度有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见下表)。

撒拉语的濒危程度评估表

指标	级别
1. 代际间的语言传承	4
2. 语言使用者总人数	95,000
3. 语言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4
4. 语言使用领域的转变	3
5. 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	0
6. 教育和读写语言材料	1
7. 政府机构的语言态度与政策及语言的官方地位与使用	3.5
8. 族群成员对自己语言的态度	4
9. 文献的数量与质量	3

尽管在以上九个指标中，撒拉语在其中最重要的指标“代际间的语言传承”上级别为4级，但根据综合情况，我们认为撒拉语仍然是一种濒危语言。

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教授在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进行排序研究时，将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按活力情况分为充满活力的语言，有活力的语言，活力降低、已经显露濒危特征的语言，活力不足、已经走向濒危的语言，活力很差、已濒危的语言，无活力、已经没有交际功能的语言等六种语言。根据他的研究，撒拉语属于活力降低、已经显露濒危特征的语言。<sup>[11]</s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成员之一Arienne Dwyer (杜安霓)教授也谈到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考虑到多语的需要和撒拉语使用范围的缩小，撒拉语很有可能只在私人场合受到重视，但是它的影响在其他方面会进一步减少，特别是由于没有母语学校教育和拼写符号(译者注：撒拉语已经有了使用范围还很有限的拼写符号)。由持续不断的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在撒拉语的各个层面上都将发生。<sup>[12]</sup>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撒拉语是一种濒危语言。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将以一个撒拉族村子的语言使用情况来说明撒拉语的濒危状况。

三、个案调查——石头坡村的撒拉语使用情况

石头坡村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的一个撒拉族村子，位于黄河南岸，临平公路穿村而过。村东约三四公里是循化县城，村西约两三公里是街子三岔集市，村南就是撒拉族的发祥地——街子。

2005年，石头坡村有144户，共823人。<sup>[13]</sup>该村绝大部分人是撒拉族。其中一些人自称是撒拉族，但他们的身份证上写的却是回族。村中有四位退休干部居住，其他人都是农民。全村有456.9亩地，人均0.39亩。根据村委会报告，2005年村里人均年收入为1,444元。2005年，村里的完全小学有114名学生，9名教师，学生入学率为100%。

该村村民之间无论男女老少，都主要以撒拉语来交流。填报回族的村民之间用汉语和撒拉语两种语言进行交流。但是，该村的撒拉语受汉语影响很大。当他们说撒拉语时，其中有很多词汇都是

汉语词汇,几乎所有新事物的名称都是汉语名称。2006年,当我在街子三岔的一个商店帮助一个石头坡村的年轻男子时,我向他询问店里商品的撒拉语名称。他给我说出了150多种名称。让人吃惊的是,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名称才是撒拉语,其他的都是汉语词汇。如gezhuī(螺丝刀)、shoucǎnzi(手钳子)、zenzi(剪刀)、gangchī(钢尺)、luosi(螺丝)、jobu(胶布)、sulio jobu(塑料胶布)、zhadao(铡刀)、bošensi(保险丝)、xuazhuan(花砖)等都是汉语词汇。对于店中的商品,可能有撒拉语的名称,如ax(白)、ala(花)、gōx(蓝)、boyix(颜色)等都是有关颜色的撒拉语词汇。但当这些撒拉语词汇无法准确地区分商品之间的细微颜色差别时,这个店员就放弃使用这些原有的撒拉语词汇而转用汉语词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撒拉族男子并没有受过一天的学校教育,因此,他的语言可以说反映了没受过汉语学校教育的普通撒拉族群众的撒拉语面貌。至于,那些受过汉语学校教育的撒拉族的语言,受汉语影响程度只会更深。一般而言,借词不一定导致语言的衰退,但当一种语言大量地从别的语言吸收借词,而自己又不创造新词来面对新事物时,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处在较危险的境地。<sup>[14]</sup>许多当地的非撒拉族人都说他们能听懂撒拉族之间的谈话,原因就是因为在用撒拉语进行的谈话当中有许多词汇都是汉语。

这种情况在撒拉族儿童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我让40个撒拉族儿童(三四岁到八九岁左右)用撒拉语和汉语来数数时,结果令人吃惊。有3个孩子根本不会用撒拉语数数;剩下的绝大多数不能数到10;只有10个孩子大概能数到10以上,最多的也只能数到29。当他们用汉语数数时,有3个孩子根本不会数数,有6个孩子能数10以内的数,其他的数上百都没有任何问题。当我用撒拉语问及家庭人口数时,只有四分之一的儿童用撒拉语来回答,其他的都用汉语数字。虽然成年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用汉语数较大数字,但他们一般会用撒拉语。有时,他们也用撒拉语来数较小数字。以上情况,清楚地表明撒拉族儿童的汉语数数能力远远超过撒拉语数数能力,尽管撒拉语是他们的母语。根据笔者观察,当孩子们在学校或在家里玩游戏时,许多孩子唱汉语歌曲,口中喊着汉语语词。

在当地儿童的撒拉语活动中,笔者时常可以观察到语码转换现象。所谓语码转换就是指“双语人在同一内容的说话过程中往往进行不同语码之

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两种语码间的混合”。<sup>[15]</sup>当孩子们用撒拉语给我讲故事时,在他们的讲述过程中有许多词汇甚至语句层面上的语码转换。如,笔者观察到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一边有趣地注视着满地走动的蚂蚁,一边用汉语自言自语:

(1)

mayi banjia she guodao, mingtian bi you da yu dao.  
蚂蚁搬家蛇过道 明天必有大雨到  
‘蚂蚁搬家蛇过道,明天必有大雨到’。

然后他又转到撒拉语:

(2)

etisi yaǒmur yaǒ-qa.  
明天雨下-将来  
‘明天要下雨’。

他首先用汉语描述蚂蚁跑动的现象,并用汉语判断明天要下雨,然后,再用撒拉语进行第二次相同内容的判断。这说明在表达上述意思时,对他来说,使用汉语比使用撒拉语更方便。在笔者翻看他的作文本时,发现里面有一句关于路边风景的描写。他用撒拉语给我重述这句内容:

(3)

diu yidabang, yidabang seji,shu,dal baš-inda gī  
那一大帮一大帮麻雀树树上面-在歌  
撒汉汉撒汉撒撒汉  
changnī-janī, inji vu tiaoli-ba.  
唱-后然后舞跳-正在  
汉-撒撒汉汉-撒  
‘有许多麻雀在树上唱歌跳舞’。

例(1)和例(2)显示了这个男孩在语句层面上在汉语和撒拉语之间的自由转换。与此不同的是,在例(3)所谓的撒拉语中汉语和撒拉语词汇是混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撒拉语句子中,有12个词语和短语。“diu”、“seji”、“dal”、“bašinda”和“inji”是撒拉语词语和短语。“yidabang”、“yidabang”、“shu”、“gī”和“vu”是汉语词语和短语。“changnī-janī”和“tiaoli-ba”中撒拉语和汉语混合在一起。这个句子中,正好一半是汉语词语和短语,一半是撒拉语词语和短语。但是,当这个男孩用汉语讲故事时,其间没有一个撒拉语词汇。这说明他的撒拉语受汉语的影响很大,但他的汉语受撒拉语的影响极小。如果说,他的汉语受了一点撒拉语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撒拉语音方面。



除了极个别的老年妇女外,绝大部分石头坡村民都会说汉语。只要孩子们从村里小学毕业,他们也会讲汉语。考虑到100%的入学率,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们很快就会变成双语使用者。而且,由于当地学校教育没有撒拉语方面的教育,撒拉语的濒危程度在将来会变得更加严重。

2003夏天,笔者在石头坡村采访了一位撒拉族老人。他是村里第一个能读写汉语文的人。他说,80年前村里没有一个人识汉字。那时,村里人不想学汉文。即使当地政府强迫他们去别的村子上汉语学校,他们也想办法雇佣汉族小孩去上学。但是,当石头坡小学于1975年建立起来时,撒拉族儿童逐渐开始学习汉语。现在,村里的所有学龄儿童都在学习汉语。撒拉族人民对汉语的积极态度和撒拉语的濒危情况是直接相关联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对汉语的积极态度会导致撒拉语的濒危状况呢?下面,我们将着重谈谈导致撒拉语濒危的原因。

#### 四、撒拉语濒危原因分析

##### (一)关于语言濒危原因的几种解释

语言濒危乃至消失的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存在着,其濒危、消失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因灾害、战争等原因引起语言使用群体的消亡而最终导致语言消亡的,也有因民族融合引起文化同化而导致语言消亡的。在历史上,语言濒危、消失的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但在过去的百年当中,语言消失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广前所未有,令人触目惊心。对此,语言学家们努力探究其深层原因,以期做相关的应对工作。国外语言学家们关于语言濒危原因的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内的语言濒危现象。

北美地区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土著语言的濒危及消失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对此,帕默(Palmer)<sup>[16]</sup>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是语言使用群体自己的决定和行为导致了他们语言的濒危,换句话说,是语言使用群体自愿放弃他们的语言的。对于这种假设,我们认为并不能合理地解释北美地区有着不同背景和文化的语言使用群体会有同样的决定和行动而在上世纪导致他们语言的濒危。而且,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土著语言使用群体想保留他们的语言。<sup>[17]</sup>(2)是来自于外界的对语言使用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压力导致了土著语言的濒危,但这种语言的濒危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模式。

这种假设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么多语言会同时面临这种濒危现象。(3)是来自于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解释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在之后的内容中我们将结合撒拉语的情况详细分析这一点。

其他许多学者也对语言濒危的成因做了积极的探索。其中有些学者认为,语言的濒危与该语言的声望有关。他们认为,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往往放弃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声望高的语言。声望高的语言被认为是高级的、强有力的工具,有更强的能力表达复杂的思想;声望低的非标准语言被认为是简单的、只能有限地表达复杂的思想等。这些人群把自己母语和强势语言之间的区别看成是自己语言本身的缺陷。因而,他们也就慢慢地为了声望高的语言而弃用自己的语言。<sup>[18]</sup>

有的观点认为,拥有书面语的语言优于没有书面语的语言,那些没有书面语的人群在认识能力上比拥有书面语的人群要低一点。<sup>[19]</sup>因此,许多没有书面语言的人群,想要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字系统来拼写自己的语言,拥有自己的书面读写材料,也为以后的语言复兴工作打基础,获得语言声望。为此,有些学者断言缺乏书面读写材料是土著语言濒危的最重要的原因。<sup>[20]</sup>

还有的学者提出,不平衡的双语教育是语言濒危的原因。如果孩子们学习自己的母语的机会少于学习强势语言的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学习自己的母语,那么,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他们母语的危机。<sup>[21]</sup>

国内语言学家近年来也对语言濒危的原因做了很多分析。如徐世璇研究员提出了强制性的和自愿的两种语言同化导致语言的濒危,并指出第二种语言同化是目前一些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sup>[22]</sup>

##### (二)对撒拉语濒危原因的分析

根据笔者目前的研究,撒拉语的濒危现象主要是由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主要由缺乏语言声望或书面材料等引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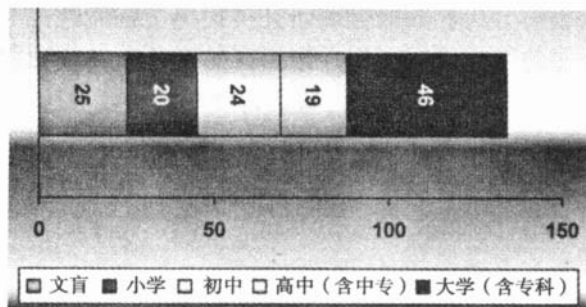
##### 1. 语言声望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撒拉族在历史上曾对汉文化持排斥态度。在二十世纪初,他们宁愿上交罚款,也不愿送孩子上学(韩五十九,石头坡村第一个识汉字的人,2003年,个人交谈)。在改革开放前,许多撒拉族人认为学习汉语会丢失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汉族人并不信仰伊斯兰教。撒拉族人对宗教是非常虔诚的,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宗教,而不是语言。他们

的宗教认同远远超过了民族认同。当他们进行族际通婚时,其前提条件不是对方的民族身份,而是对方的宗教信仰。即使在撒拉族内部通婚,他们也考虑对方的宗教派别。如果通婚双方不属于同一个宗教派别时,有时他们宁愿与属于同一个派别的其他民族的穆斯林通婚,如回族等。<sup>[23]</sup>历史上的撒拉族发现,排斥汉语是保护他们宗教信仰的一种有效方法。这就是撒拉族在历史上拒绝汉文化的主要原因。对他们来说,汉语并不比撒拉语有着更高的声望。

在改革开放初期,越来越多的撒拉族儿童开始学习汉语。这是不是跟汉语的语言声望有关呢?看起来,事实好像并不如此。在我调查的40个石头坡村儿童中,有四分之三的儿童反映他们更愿意撒拉语为他们的教学语言,而不是汉语。其他喜欢汉语的孩子们反映,他们之所以喜欢用汉语教学是因为他们学的都是汉语课本。很明显,对撒拉族儿童来说,在学校里除了学习汉语外并没有别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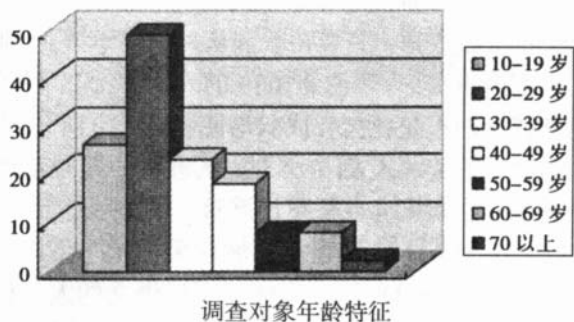
那么撒拉族成年人对他们的语言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笔者在2004年、2005年期间对撒拉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母语持积极的态度。在这次调查中,笔者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县,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及新疆伊宁县的撒拉族进行了136份问卷调查,其中两份因填写不全面作废。其余134份为有效问卷,其中男性92名,占69%,女性42名,占31%。这134人的文化程度为:文盲25人,小学20人,初中24人,高中(含中专)19人,大学(含专科)46人,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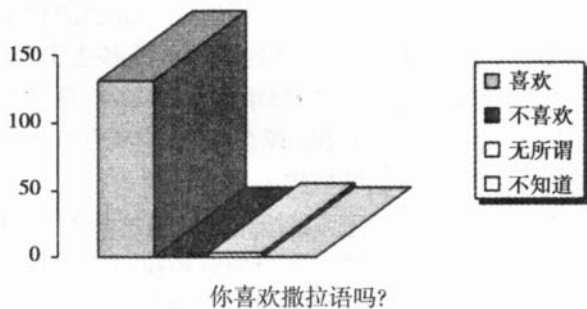
调查对象文化程度

134名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为:10~19岁26人,20~29岁49人,30~39岁23人,40~49岁18人,50~59岁8人,60~69岁8人,70岁以上2人,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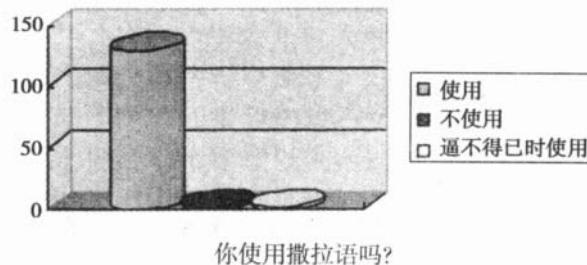
在134名调查对象中绝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撒拉语,绝大部分人说喜欢撒拉语,绝大部分人认为撒拉语很重要或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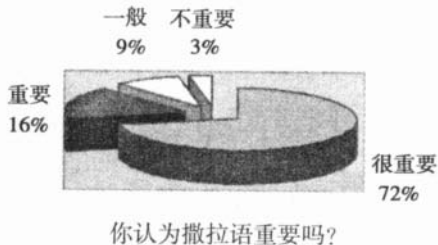
调查对象年龄特征



在以上图表中,97%的调查对象(130人)表示喜欢撒拉语,只有3%的对象(4人)表示对撒拉语无所谓。



在问及撒拉语的使用情况时,同样97%的对象(130人)反映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撒拉语,不使用和逼不得已时使用的对象共占3%(4人)(见上图)。



在问及撒拉语的重要性时,72%的人(96人)认为撒拉语很重要,16%的人(22人)认为重要,9%的人(12人)认为一般,3%的人(4人)认为不重要(见上图)。

在前面我们谈石头坡村的情况时提到,越来越多的撒拉族人开始学习并掌握汉语了。这一点



跟我们的134名调查对象的情况也非常相似。除了一人外(此人精通撒拉语和藏语),其他133人都会说汉语。因此,在目前的撒拉族社会中,绝大部分人已经掌握了汉语。

根据以上分析,绝大部分撒拉族群众对自己的母语非常喜欢且认为很重要或重要。因此,撒拉族开始学习并使用汉语,并不是认为汉语比撒拉语更有声望。其中,应该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 2. 书面文献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对撒拉族来说,撒拉语书面文献材料的缺乏也很难解释撒拉族群众对汉语的态度转变。撒拉族大规模地学习汉语约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在这之前,对撒拉族来说汉语书面材料也是容易获得的。可见,撒拉族以前对汉语缺乏热情并不是当时撒拉族得不到汉文材料。能否获得汉文材料并不是导致撒拉族对汉语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前面我们在谈撒拉族的文字问题时,也谈到撒拉族在历史上有自己的书面文献。这种文献是用阿拉伯文字母写成的,跟撒拉族的宗教生活密切相关。考虑到撒拉族对宗教信仰的执着,他们不可能为了汉语文献材料而放弃自己的书面语。因此,是否缺乏文献材料并不是导致撒拉语濒危的主要因素。

## 3. 社会经济的变化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我们认为,撒拉族最终改变对汉语的态度并且开始大规模地学习汉语,是由撒拉族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起的。下面,我们仍以石头坡村为主来说明这一问题。

大约三四十年前,石头坡撒拉族开始较大规模地将孩子送到汉语学校学习。从那时开始,该村的学龄儿童入学率逐步提高。当学生小学毕业时,他们也就能够开始用当地汉语进行交流了。为什么,从那时开始撒拉族群众逐渐对汉语有了积极的态度了呢?如果我们对石头坡村的历史做个简单的回顾,那么,我们就会了解到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石头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撒拉族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农村土地承包之前,石头坡村的撒拉族群众在公有土地上集体劳动,到了年底按劳动业绩进行决算,获得报酬。除了极少数国家干部外,绝大部分石头坡人在村里一起劳动,相互之间的交流语言就是撒拉语。他们跟外界交往的绝大部分人也是来自其他村子

的撒拉族,也用撒拉语进行交流。当需要自己无法生产的生活用品时,他们就去周边的藏族地区进行物物交换。由于这种特殊的经济联系,当时石头坡村的绝大部分男性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撒拉族和藏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藏族朋友。当撒拉族去藏族地区做生意时,他们往往住在自己的朋友家里。而当藏族群众去循化县城或去其他地方朝拜时,也往往到撒拉族朋友家住宿。<sup>[24]</sup>笔者清楚地记得,在三十多年前石头坡村经常有三三两两的藏族客人来访。

2003年,在进行云南大学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时,笔者曾和谢佐教授对石头坡村的马六十老人进行了采访。马六十老人当年88岁,是接受我们采访的石头坡村最年长的撒拉族老人之一,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往返于黄河南北两岸,通过经营农产品以物易物的方式养家糊口。由于新中国建立前后一段时期,自产的粮食不够吃,马六十老人以自产的辣子、水果和大蒜到黄河对岸化隆(今金源乡)十几个村庄换粮食。马六十老人从十四五岁开始就学做这种生意。他说自己在当地各村寨都有藏族朋友,帮他换粮食,最早的时候一斤辣子只能换到两斤粮食,后来能换到三四斤粮食(包括青稞、豌豆等)。他和周围的藏族交朋友,有时赶庙会就住在藏族家里,免费吃住,藏人到黄河南岸办事也在他家吃住。撒拉族村民将这种朋友关系称作“许乎”。当时,马六十老人根本听不懂谢佐教授讲的汉语,只好由笔者给他进行撒拉语的翻译。但当谢佐教授了解到老人会讲流利的藏语时,就开始说藏语。马六十老人也立刻用藏语回答问题。当他们用共同语言交谈时,我却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了。

自农村土地承包后,和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循化的撒拉族也摆脱了土地对他们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离开家乡,外出闯业了。撒拉族也到周边藏区做生意,但他们的足迹已不再局限于循化周边了,藏语也不再是他们和外界交流的主要工具了。越来越多的撒拉族群众和藏族群众已经掌握了汉语,他们之间更多地是用汉语进行交流了。在石头坡村,目前大约五十岁以上的男子基本上都可以用藏语交流。我接触到的一些老人甚至对藏族的谚语、民间故事等也非常熟悉。他们在和年轻人用撒拉语交谈时,也时不时引用藏族谚语、故事等说明自己的观点。撒拉语当中也有许多借词来自于藏语。但是由于撒拉族和循化

周边藏族的经济联系被更大范围的经济来往所替代,撒拉族对藏语的依赖程度就大大降低了,而汉语则是这种更大范围经济交往中的主要交流工具了。在分得自家的土地后,许多撒拉族家庭的收入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在石头坡村人均土地面积为四五分地,在邻近的街子地区,有些村中人均土地面积仅三四分地(马伟,田野调查,2000年)。仅依靠土地已很难满足撒拉族农民对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了。于是,撒拉族群众被迫外出谋生。他们当中有的在青藏高原上搞运输,并曾经成立了几家大的运输公司。在青藏铁路建成之前,撒拉族的运输业在青藏线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的撒拉族农民则办起了自己的公司,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撒拉族企业已有几家全国驰名的商标了。这些企业的员工有的多达上千人。有的撒拉族人在外地经营餐饮业,像北京、广州、深圳、上海、郑州等许多城市都有撒拉族的身影。还有很多撒拉族人在政府机关、银行、企业等部门工作。撒拉族已不再只和自己的族人打交道了,撒拉语的使用范围也就逐渐缩小,而汉语已经成为撒拉族和外界交往的主要交际工具了。2003年,一位72岁的石头坡村老人告诉我们:

我家7口人,种3亩2分地,其中苹果园占2亩1分。一年打1000多斤粮食,就是500元收入,出卖苹果能收入400元,种植业一年只有900元收入。一年买粮食需要2000元,还要出去开馆子、跑运输、卖下水,卖冬虫夏草,或者搞建筑、修路,增加收入。种庄稼要买化肥、交电费,村里现在有了电灶、自来水,这很好,但都要花销。所以目前儿子儿媳和孙子4口人在西宁,石头坡村家里剩下3口人,两处一年花销12000元左右,全家人上下努力,儿子做点生意,买卖好时一年能挣2万元,不好时就七八千元。所以,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做买卖算帐,种庄稼也得算帐。<sup>[25]</sup>

当时这位老人的两个孙子恰好也在家。我向他们问了几个问题,发现他们说一口流利的撒拉语和普通话。城市生活不仅使成人学习使用汉语,而且也使小孩很小就学会了普通话(循化的大部分撒拉族孩子所说汉语为当地汉语方言——循化话)。

当不懂汉语的撒拉族首次来到城市时,他们有诸多困难。许多事情如买车票、在饭馆吃饭、坐车等简单的事情都让他们感到吃力。他们意识到

如果外出就必须要学会汉语。在石头坡村,一位年轻的、没有上过学的小伙子告诉我:他曾去西宁市谋生,但由于他的汉语很差,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几年后,他慢慢学会了汉语,但他仍然不识字。目前,他还在闲暇时间学习汉字。这种情况在撒拉族人中是非常普遍的。为了不让他们的孩子也遭受同样的痛苦,目前绝大部分撒拉族都将子女送到学校上学。

#### 4. 双语教育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上学也是许多学子在一些正式机构如政府、学校、医院等部门找到工作的唯一途径。看到一些孩子大中专毕业后找到了正式工作,许多撒拉族家长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走这样的路。每年高考录取或考取公务员等事情永远是村民们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2005年,在石头坡村有六个大中专学生毕业后经过考试被聘用为循化县政府公务员。为此,村里部分老人里组织了一次庆祝活动。村民们对教育的这种积极实用的态度,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村里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百分之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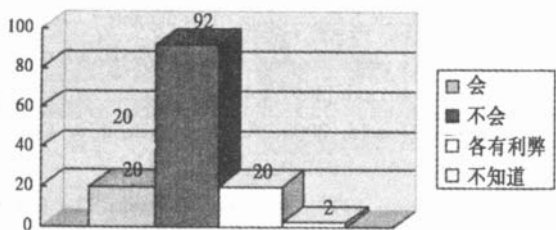
双语使用不仅不是一种消极现象,反而是一种积极的现象。根据研究,双语儿童的认知能力比单语儿童的认知能力要强,因此,双语教育是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的。教育语言学家布莱恩指出,双语使用者在理论分析语言方面比单语使用者强,双语人员有着更多的创新思想。他还引用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说:

双语教育对儿童的概念形成、分类、创造力、类比推理和视觉空间技术等方面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双语教育在纯语言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包括早期词的指称区别能力,对语言结构和细节的敏感度,对语言歧义的辨别能力,对在句子处理中的句法认识能力,和语言控制能力等方面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作用。<sup>[26]</sup>

可见,双语教育不但不是对儿童的学习负担,相反,它对提高儿童的智力有着较大的积极作用。令人欣慰的是,撒拉族群众对此也有着较为正确的认识。在笔者进行的134份问卷调查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果撒拉族儿童学习撒拉语将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学校教学质量。调查结果如下图表:

因此,在民族聚居区应该进行双语教育,这对民族儿童的智力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对保护民族语言和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撒拉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除了国家规定的统一的教学内容外,并没有母语文化的教育。尽管撒拉族儿童在学





孩子学习撒拉语会妨碍教学质量吗？

学校里可以使用撒拉语,但是学校的语言教学是汉语教学(当然也有英语教学),教学材料都是汉语材料。在学校里,撒拉族学生根本没有机会通过学习来提高母语能力。这也解释了我们前面所谈的:为什么撒拉族儿童的母语数数能力远远低于汉语数数能力;为什么撒拉族儿童只唱汉语歌曲;为什么在他们的撒拉语里有许多汉语词汇,但汉语当中却没有撒拉语词汇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跟学校的单语教育有关。而学习汉语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近来撒拉族社会经济的变化。

#### 5. 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撒拉语的濒危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撒拉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这与撒拉语的濒危现象紧密相关。首先,撒拉族社会与外界的联系比起以前更容易了。2000年,一位82岁的石头坡村老人告诉我,在他们年轻时交通不便,他们一般步行去西宁,仅单程就需要走三天。现在,从循化到西宁坐车只需两三个小时。从石头坡村到县城也只需几分钟。仅在过去的十五六年中,石头坡村已有二十多人去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过觐。目前,石头坡村至少一半的家庭都安装了电话,许多年轻人拥有手机。超过一半的家庭都有电视,有的还拥有DVD或VCD等,甚至个别人在使用电脑,并不时上网了解相关信息。还有部分人在西宁市购买了住房。这种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撒拉族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而与外界联系的交际工具则主要是汉语。

其次,从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使得撒拉族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丢失。例如,随着电视等家用电器的普及,他们就不需要讲述传统的撒拉语民间故事来娱乐了。撒拉族传统的神话、歌曲、传说、笑话等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儿童们通过民间文学的听、讲、唱等形式来学习撒拉语的机会也在不断消失。相反,由于对汉语接触机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撒拉族儿童感觉到汉语的重要性,也愿意学习汉语了。在笔者进行的一百多人的问卷调查和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对象也都认为汉语很

重要,撒拉族应该学习汉语。因此,一方面是撒拉族民众对汉语的需求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却是母语文化的不断丢失。

再次,撒拉族所使用的所有新商品几乎都来自于外面,他们没有创造新的撒拉语名词术语,而完全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对新事物都用汉语来指称。所以,一方面撒拉语中的汉语借词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丢失许多原有的撒拉语词汇也在不断消失。因此,撒拉语的濒危情况目前正在不断加剧。这预示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也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 五、结论

虽然就使用情况、撒拉族群众对自己母语的态度等方面而言,撒拉语还处在较好的保持状态,但考虑到撒拉语自身的变化、功能的衰退,我们认为撒拉语已处在濒危状态当中。撒拉语的濒危情况与撒拉族社会所发生的社会经济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与社会经济变化相关的学校教育也是导致撒拉语消失的重要因素。而语言声望、书面文献等并不是导致撒拉语濒危的直接因素。

#### 注释:

马成俊,个人交谈,2008年5月。

只有极少数撒拉语研究人员使用以拉丁文字母为基础的拼写符号,并有相关学术著作出版。最近,在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撒拉族》刊物和“中国撒拉族”网站(www.cnsalar.com)上开始使用统一的撒拉语拼写符号。此外,近两三年来,还有一些年轻人在自办的网站上也使用类似的拼写符号。但目前,撒拉族还没有广泛认可的正式拼写符号。

根据笔者在青海省西宁市参加的2001年国家民委民族语文工作人员培训班情况汇报和笔者2006年的田野调查而写。

根据UNESCO文件编制。

此文撒拉语拼写以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使用的撒拉语拼写符号为准,详见中国撒拉族,2008年第1期。

此处“撒”代表撒拉语,“汉”代表汉语。

#### 参考文献:

[1]民族语文记者.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纪要[J].民族语文,2006(6).

[2]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2003.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Document approved at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UNESCO Programme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Paris.10- 12 March. 见 <http://lesla.univ-lyon2.fr/IMG/pdf/doc-461.pdf> [2007年4月8日]。参见:范俊军编译,孙宏开审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38.

[3]SIL International. Endangered Languages. <http://www.sil.org/sociolx/ndg-lg-faq.html> [2008年6月8日].

[4]依布拉·克力木(韩建业).谈历史上的撒拉文--土耳其文[J].语言与翻译,1989(3).

[5][25]朱和双,谢佐主编.撒拉族--青海循化县石头坡村调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35,145.

[6]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7]Edwards, John. 1992. Sociopolit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oss: towards a Typology of Minority Language Situations. In L. A. Grenoble and L. J. Whaley ed. Endangered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5- 26.

[8]Michael Krauss.1996.Status of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 Endangerment. In G. Cantoni ed. Stabiliz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Flagstaff: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16- 21. 参见: <http://www.ncela.gwu.edu/pubs/stabilize/index.htm>. Accessed on April 8, 2007.

[9]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Document approved at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UNESCO Programme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Paris.10- 12 March: 见 <http://lesla.univ-lyon2.fr/IMG/pdf/doc-461.pdf> [2007年4月8日].参见:范俊军编译,孙宏开审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0- 53、137- 168.以下评估指标及级别标准均来自这个文件.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第4卷第1、2册.拉瓦尔大学出版社,1995年。转引自何俊芳.也论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问题[J].民族研究,1999,(3).

[11]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5).

[12]Arienne Dwyer. Salar: A Study in Inner Asian Areal Contact Processes, Part I: Phonology.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2007: 93.

[13]石头坡小学.石头坡小学工作汇报(油印材料),2005年.

[14]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Document approved at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UNESCO Programme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Paris: page 11. 见 <http://lesla.univ-lyon2.fr/IMG/pdf/doc-461.pdf> [2007年4月8日].

[15]Winford, Donal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03.

[16]Palmer, Scott. 1997. Language of Work: The Critical Link between Economic Change and Language Shift. In Jon Reyhner ed. Teach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Flagstaff, AZ: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263- 287.

[17]Crawford, James. 1996. Seven Hypotheses on Language Loss: Causes and Cures. In G. Cantoni ed. Stabiliz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Flagstaff: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51- 68.

[18]Dorian, Nancy. 1998. Western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Small- language Prospects. In Endangered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ed. by Lenore A. Grenoble & Lindsay J. Wha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21.

[19]Hinton, Leanne and Ken Hale, eds. 2001.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39.

[20]Salinas Pedraza, Jesús. 1997. Saving and Strengthening Indigenous Mexican languages: The CELIAC Experience: 173. In Nancy Hornberger ed. Indigenous Literacies in the Americas: Language Planning from the Bottom up.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171- 187.

[21]Pye, Clifton. 1992. Language Loss among the Chilcot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93:75- 86.

[22]徐世璇.语言濒危原因探析--兼论语言转用的多重因素[J].民族研究,2002,(4).

[23]马成俊.土库曼斯坦访问纪实[J].青海民族研究,2001,(1);马伟,田野调查,2006年.

[24]马伟.撒拉族与藏族关系述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1).

[26]Hinton, Leanne and Ken Hale, eds. 2001.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17.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红峰]